

〔美〕理安·艾斯勒 (Riane Eisler) 著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权—性—钱”三部曲

圣杯与剑

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

The Chalice & The Blade
Our History, Our Futur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美] 理安·艾斯勒 (Riane Eisler) 著

程志民 译

“权—性—钱”三部曲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圣杯与剑

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未来

The Chalice & The Blade

Our History, Our Futur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权一性一钱”三部曲
圣杯与剑

——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

著 者 / [美] 理安·艾斯勒
译 者 / 程志民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 政 编 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 站 支 持 / (010) 65269967
责 任 部 门 / 编译中心 (010) 85117871
电 子 信 箱 / bianyibu@ssap.cn
项 目 经 理 / 许春山
责 任 编 辑 / 祝得彬 邹沁芸
责 任 校 对 / 邓晓春
责 任 印 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 者 服 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20.25
字 数 / 337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587 - 2
著 作 权 合 同 / 图字 01 - 2008 - 2429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 / [美] 艾斯勒 (Eisler, R.)
著；程志民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权—性—钱”三部曲)
ISBN 978 - 7 - 5097 - 0587 - 2

I. 圣... II. ①艾...②程... III. 社会人类学 IV. 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14256 号

Riane Eisler

The Chalice & The Blade;

Our History, Our Future

Copyright © 1987 by Riane Eisler

本书根据 HarperCollins 出版社 1987 年版译出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学术顾问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 于 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所长、研究员
马 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王逸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冯 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教授
爱德华·弗里德曼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教授
刘 东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
刘树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
朱云汉 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
汝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学部委员
米 健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所长、教授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
汪 晖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苏国勋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陆象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原总编辑、顾问，研究员
周 宪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周晓虹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罗志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俞可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
俞吾金 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姚介厚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
徐 勇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徐友渔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钱乘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曹卫东 北京师范大学宣传部部长、人文学院教授
黄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研究员
黄 进 武汉大学副校长、教授
黄俊杰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编审
韩冬雪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出版者话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密不可分的，其中国外优秀学术著作的引进、译介和出版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前导、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对于欧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引进和译介可以追溯到1839年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和1842年魏源汇编的《海国图志》。但较为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学术文化及其方法论和世界观，则肇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和高君武等一批著名思想家。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对于译著的积极倡导，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做了舆论和理论准备。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进和译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更不待言。毛泽东曾经称赞《反杜林论》的译者“功不在禹下”。早在延安时代，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翻译工作的决定”。回顾从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20世纪30年代，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共和国初期到“文革”前夕，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从反对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到今天的文化和学术的进一步繁荣的整个历程，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伟力，同时也可以看到国人的思想解放、心智跃升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国际交流、吸纳、融合、批判、抵御和斗争形成一种密切的互动态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为己任，在创建之初就把编辑出版反映当代国外学术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及跨学科研究等学术动态的译著，作为其重点之一，先后推出了《社会理论译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政治理论译丛》、《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全球化译丛》、《阅读中国》等系列丛书，单书品种达300有余，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本着选择精品，推陈出新，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权威、前沿、原创的原则，

以 20 周年社庆为契机，我们在整合、提升和扩充既有资源，开拓创新的基础上，隆重推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新礼物。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力求展示三方面的主要特色。其一是时代意识。众所周知，20 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科学认识的普遍进步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学术界思潮迭起，此消彼长，哲学社会科学经历着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无论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或者在研究的方式、工具和手段上，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突出当代的这种革命性变革，把译介比较系统、深入地梳理和论述这种变革的富有代表性的著述，当做首要的努力方向。

其二是问题意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内容的突破，引起理性认识和理论思维的基本方式的改变，促使科学认识中自觉的主体性原则日益突出，并导致整体认识论与个体认识论的融合，使人们有可能以具体化和定量化的方式来描述世界的普遍联系，从而要求学科知识本身的不断革新，学科之间——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各个学科之间，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开放和广泛合作，以及问题意识、跨学科意识和应用意识的不断加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以问题、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为主线，打破学科的单—界限和分类，整合成多个系列，突出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本身的多重视角。

其三是开放意识。科学发展的意义本质上在于从不知到知的飞跃，逐步超越认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不断接近客观真理。开放性成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显性特征，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社会变革不断深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开放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促进不同学派之间及每个学派内部的不同观点的对话和讨论，激励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思想的涌现。同时，在学科的类型布局上，也不拘泥于传统的范围和分类，更加侧重向多学科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及著述开放。

我们将始终坚持把“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理论创新，译介世界精品，借鉴先进文明”作为编辑《社科文献精品译库》的基本理念。殷切期望学术界同仁、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给予支持，不吝赐教和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 6 月

“权—性—钱”三部曲总序*

非常荣幸看到我的新书《国家的真正财富——创建关怀经济学》在中国翻译出版，同时，我过去的两本书《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和《神圣的欢爱：性、神话与女性肉体的政治学》也一同再版发行。

《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介绍了伙伴关系模式和统治关系模式两种可能的基本社会模式。剑代表生杀大权，统治的权力，毁灭的权力。圣杯则代表一种完全不同的权力，给予的权力，养育的权力与启迪的权力。用现在通行的话来说，圣杯代表给予权力而不是剥夺权力，因而更适合作伙伴关系取向的文化。

我的第二本书《神圣的欢爱：性、神话与女性肉体的政治学》，集中讨论伙伴关系和统治关系两种模式透视下的性行为。我最近的作品《国家的真正财富——创建关怀经济学》，则用伙伴关系和统治关系两种模式为透镜分析经济学，如副标题所言，倡导创造一种关怀经济学。

尽管我在写这三本书时并没有这样的想法，然而它们事实上构成了一部三部曲：权力、性和金钱。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们三者是推动人类的动机和行动的最强有力的杠杆。说到底，我的工作是一种积极的探索，旨在更好地理解 and 改善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事实上我工作的驱动力来自我对包括我的孙儿女在内的所有孩子们的关怀。

我和其他很多人的研究都证明，现代科技和统治关系的社会系统相结合，就会把人类的进化带向死亡的深渊。但同时也证明，我们可以走向一

* 中文版总序前半部分由三本书的作者艾斯勒英文撰写，田海川译；后半部分由三本书的引荐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闵家胤撰写。

个更可持续、更平等、更和平的伙伴关系的世界。若要实现这样一个世界，就要求我们开始超越习惯的社会划分范畴来思维，如宗教的和世俗的、左的和右的、东方的和西方的，以及发达的和欠发达的这样一些划分。同时也要求人们看清这个社会中的所有关系、信仰和制度的整体。如爱因斯坦指出的：你不能用跟造成问题的思维相同的思维去解决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在研究过程中我使用一种叫关系动力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源于作为论据的事实基础，这种方法看到包括史前史在内的人类历史整体；看到包括男性一半和女性一半的人类整体；看到我们生活的整体不仅包括通常界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还包括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我们的家庭和其他私密的关系。政治和经济的分析忽略了作为社会系统核心要素的童年和两性关系的文化建构，因而不能提供构建一个更为和平、平等和可持续的社会所需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伙伴关系系统和统治关系系统研究提供的可能性，受到国际强烈关注的原因。

《圣杯与剑》被人类学家 A. 蒙塔古 (Ashley Montagu) 说成“自达尔文《物种起源》以来最重要的一本书”。《圣杯与剑》已被翻译成 23 种文字出版，不仅有中文，还有韩文、日文、阿拉伯文、犹太文，以及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神圣的欢爱》同样传布全球。还有我的其他一些作品：《明天的儿童》概述伙伴关系教育的基本内容。《伙伴关系的力量》作为个人、社会和经济转型的指南性著作获得了 2003 年的鸚鵡螺图书奖 (Nautilus——改变世界图书奖)。我最近的作品《国家的真正财富》被组织管理大师彼得·圣吉 (Peter Senge) 称为“正所急需”，被图图大主教 (Archbishop Desmond Tutu) 誉为“我们迫切追求的理想与世界的支柱”，被受人爱戴的科学家和活动家 J. 古多尔 (Jane Goodall) 称为“呼唤行动之作”。

下面这些例子表明，其他一些学者也运用了这种新的伙伴关系系统与统治关系系统的社会范畴。199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学者出版了《中国文化中的圣杯与剑》一书，用历史文献证明史前社会中国文明从伙伴关系模式走向统治关系模式的演变以及当代走向伙伴关系的努力。著名苏美尔学者 S. N. 克雷默 (Samuel Noah Kramer) 运用这种理论框架完成了他的一部新作《恩基的神话》(The Myths of Enki)。在意大利，一种供欧洲知识分子阅读的期刊 *Pluriverso* 致力于研究文化转型问题；在乌迪内大学

(University of Udine)，一直举行这个主题的研讨会。在其最后的著作《女神的文明》中，考古学家马里亚·金布塔斯 (Marija Gimbutas) 运用这种分析理论推进了她自己对史前史的解释。在 2008 年，玛丽·柯克 (Mary Kirk) 教授运用伙伴关系和统治关系理论构建了她的新作《性别和信息技术：促成共创全球伙伴关系》。加拿大学者 B. 格里芬 (Brian Griffin) 把这种理论运用到了他的著作《爱的不同景象：基督教历史中伙伴关系和统治关系的价值》中。

很多期刊和文集发表的文章都通过这种新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潜在的将来。例如我和神经学家 D. S. 莱韦恩 (Daniel S. Levine) 合写的《天性、教养和关照：我们不是基因的囚徒》。我对个人暴力、战事和其他形式群体暴力之间的联系的分析引领了大批的出版物，包括《暴力、和平与冲突百科全书》和《和平世界百科全书》。

我的书也被指定为大学课程读物，学科范围从社会学、心理学、组织发展和政治学到教育学、女性研究以及和平研究。我还有很多关于伙伴关系模式与统治关系模式的演讲稿。

伙伴关系研究中心 (CPS) 也是由这个概念框架引导研究。例如，《女人、男人和全球生活质量》用了三年时间研究，在 1995 年发表。该项研究使用 89 个国家的数据，不仅证明在衡量生活质量方面仅仅采用国内生产总值 (GDP) 和国民生产总值 (GNP) 是不够的，而且为采用新的、更可靠的人文指数作衡量标准奠定了统计学基础，进而证明女性地位处于一个国家生活质量的中心位置。

对伙伴关系系统和统治关系系统的兴趣促成了我受邀到全球各地作讲座。邀请者包括国家元首和政府要员，如原德国上议院议长里塔·苏斯穆特 (Rita Suessmuth) 教授、原希腊第一夫人玛格丽塔·帕潘德里欧 (Margarita Papandreou) 和原捷克共和国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 (Václav Havel)。还有一些公司也邀请我，如瑞士联合银行、杜邦、微软、迪斯尼、宝洁、摩根斯坦利。我还应邀在有关和平、健康和环境的会议上作主旨演讲。

最近我重返教学工作。加州法学整体研究博士和硕士学位项目以伙伴关系研究为中心转变领导方式。我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与学生交流受益匪浅。这个有关领导方式的项目旨在激励领导人以革新方式探索前沿问题。由于这个项目是在网上公开的，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参与。帮助未来的领导者理解伙伴关系模式和统治关系模式的系统动力学，这对我来说

是一种快乐。

在早些的书里我提出伙伴关系系统的起源在人类的史前史。在后来的著作中，我集中注意当代有伙伴关系构架的文化，不管是像菲律宾的泰杜蕾（Teduray）那样的部落文化、苏门答腊的米南卡包（Minangkabau）那样的农业文化，还是像瑞典、挪威和芬兰那样的工业和后工业文化。

北欧国家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们示范的伙伴关系不仅仅更人道，不仅仅使环境更可持续，而且使经济发展更成功。

瑞典、挪威、芬兰的民主文化不存在拥有者和一无所有者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些国家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非暴力冲突解决问题的先锋。它们立法禁止在家里体罚孩子。它们开展声势浩大的男人运动，消除统治欲和暴力构成的“男性特征”。它们的社会犯罪率很低，开创和平研究，经常在国际纷争中起调节作用。至于伙伴关系取向的第三个关键组成部分，那么在这些国家，女人扮演很重要的领导角色，在立法机构中占据将近40%的席位。

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很多传统上被定义为属于女性的特征和行为，诸如带孩子、非暴力和照顾别人，在以上北欧国家都被认为适合于男性。所以，那些被称为“女人的工作”，如照顾病人、照料小孩和老人均得到优厚的财政支持。有充裕的基金用于全民的健康保健、孩子生育补贴、双亲育儿补贴，以及让老人过上体面生活。

简而言之，这些国家推行关爱经济政策，大量投资于后工业知识经济最重要的资本：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神经学表明，人力资本质量很大程度上要看孩子们受到何种程度的关爱。所以，我们必须注意过去被我们忽略的“妇女和孩子的问题”。

不能忘记，在20世纪初北欧国家是很贫穷的。然而，由于它们的关爱政策，如今它们变得繁荣富强。在联合国人类发展年度报告上北欧国家稳居前列，同时也在全球经济论坛竞争力报告上名列前茅。至于教育，国际性考察显示北欧国家在阅读、数学和科学的能力测试方面也令人信服地排在最前面。

这种伙伴关系取向的社会并非完美。然而它们生动地证明，由于实行关爱政策，更和平、更可持续和更平等的生活方式是可行的。我们从它们的社会中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是一条显而易见的道理，那就是，一种文化构建其首要人际关系——女人与男人、父母与孩子之间关系——的方式，

是信仰和价值的根基，同样也是其所有制度性建构的基础，从家庭到教育，到宗教，最后到政治和经济领域。

不无讽刺的是，仍有人试图把我们推回到过去“美好的时光”，推回到多数男人和所有女人都依照统治关系模式僵化的社会等级给自己定位的时代，而这些人也总是承认基本人际关系对社会的重要性。希特勒在德国、霍梅尼在伊朗、塔利班在阿富汗和极右翼原教旨主义在美国，这些人都鼓吹让女人“回到传统家庭”中的“传统位置”具有优先重要性。这个说词的含义就是回到权威主义家庭中去，女人处于服从地位，而孩子知道质疑家长是要被痛打一顿的。

绝非巧合，那些参与“9·11”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正是来自那种妇女和儿童屈服于恐吓和压迫的文化。同样并非巧合的是，美国的基督教右翼势力最初组成一个强力政治社团也是围绕着“妇女问题”——挫败提议中的美国宪法“平权修正案”。

然而，许多致力于平等与和平的人，依然把“女性权利”和“儿童权利”视为次要问题。他们无视联合国的报告所讲的事实：对女性和儿童施加的暴力依然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最普遍存在的人权暴力问题，男性地位高于女性依然是儿童最早接触到的基本的模式，与此模式相应的是男性的优越感和女性的低劣感，而这又在不同的宗族、宗教和种族中代代相传。

我们首先要改变家庭成员之间暴力和不平等的固有模式。当孩子亲身感受暴力，或者眼睁睁看着暴力施加于他们的母亲时，他们学会了一个人通过暴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是可以被接受的——他们会把这种做法沿用到私密关系和国际关系中去。如果孩子们生长的家庭中女人服务而男人被服务——就像世界很多地区那样，女人得到较少的食物和健康关爱——他们就学会了接受生活中所有领域的经济上的不公正。

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全面的政治议程，对幼年时期和两性关系给予特殊的关注。然后我们才会有更平等、更和平以及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基础。

为了让子孙后代学会按伙伴关系方式生活和相爱，我们现在就需要打下基础。我们有义务为我们的子孙这样做。对今人而言，是挑战也是机遇。

作为艾斯勒这三本书的引荐人和中文版的主要组织者，作为中国伙伴

关系研究小组的负责人，我愿接下来就这三本书的内容、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作进一步的说明。

艾斯勒着手这个主题的研究和这三本书的创作起始于1976年，触媒是在此之前欧洲考古工作中的爆炸性新发现——挖掘出了许多属于欧洲史前史的文明遗址，特别是地中海靠近希腊半岛的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从而使深埋于地下无文字记载的欧洲母系社会文明重见天日。

现行的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历史教科书，都说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的古埃及，随后是公元前2500年中东的苏美尔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至于欧洲本土文明，则说成是后来从外面输入的，不但比上述几种文明晚得多，而且比古代中国和印度的文明也晚得多。

20世纪70年代在东南欧出土的母系社会文明遗址则告诉我们，早在公元前3万年欧洲本土居民就进入了旧石器时代，公元前1万年就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从公元前7000~前3500年古代欧洲早期文明遍及欧洲东南部。那些地方已经进入农业文明，有定居的村落；建筑业发达，甚至建有两层的神殿；崇尚艺术，制陶业兴盛，留下了许多彩陶小雕像和壁画。从出土的米诺斯文明看，当时的克里特岛上有“宏伟的宫殿、别墅、农场、港口设施、贯穿全岛的公路网、教堂和秩序井然的墓地”；还有“高架桥、碎石路、瞭望塔、路边凉亭、水管、人造喷泉和水库”；有四种笔迹的文字，后期已使用青铜器；居民的生活是相当“现代化”的：“所有城市中心都有完备的污水排放系统、卫生设施和家庭厕所。”大量的壁画、雕像、花瓶、雕刻品体现出活泼快乐的艺术风格。总之，人类后世文明的基本要素都进化出来了，其农业和水利之进步、建筑和手工业技术之高超、艺术和宗教之发达，使“考古学家们被惊得目瞪口呆”，而这一切都是在被称为母系社会的史前社会里进化出来的。

最令人惊奇的是，建筑遗址和艺术品反映出了对女性、母亲和女神的崇拜。例如，在旧石器遗址发现的摆成阴道形状的玛瑙、贝壳和红赭石，以及到处都有的裸体维纳斯小雕像，它们反映出的是原始人的一个重要观念：女性的身体是生命之源，是赋予生命的圣杯。到新石器时代，上述观念已经进化成女神崇拜文化和宗教。出土的大量石雕、浮雕和泥塑女神雕像，说明那时供奉的都是女神，“上帝是一位女性”，而主事的女祭司和女首领则是世俗权力和智慧的最高代表。

另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是没有发现战争的遗迹，没有发掘出武器贮藏

室和军事防御工事；艺术作品中没有武士形象，没有战争场面，甚至没有狩猎的场面；还有就是没有首领的陵墓和殉葬者的遗骨。这说明，尽管那时的首领都是女性，并以母系追溯血统和继承财产，但是没有类似后世“父权”那样的“女权”和女性君王。女神的手臂高举圣杯，它象征母亲的责任、关怀和爱。当时妇女并不君临和欺压男子，相反，两性维持着平等、依靠和合作的伙伴关系。人与大自然也维持着和谐的伙伴关系。

在公元前 5000 ~ 前 3000 年这段时间里，这种男女平权和合作的伙伴关系社会模式和相应的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来自欧亚大陆北部由男性祭司和武士统率的好战的游牧民族三次大规模南下，以手中的剑击碎了圣杯。我们今天看到的高鼻梁、深眼窝、蓝眼珠、黄头发的印欧人种，其实并不是欧洲大陆的本土种族，而是入侵者的后裔。入侵东欧的叫库尔干人，入侵希腊半岛的叫阿哈伊亚人和多利安人，入侵小亚细亚半岛的叫赫梯人和米塔尼人，一直打到印度的叫雅利安人，打到迦南（巴勒斯坦）的则是属于闪米特的希伯来人，后称犹太人，建古以色列国。

这些男性武士率领的具有统治关系等级结构的强大骑兵，对女性伙伴关系和平、繁荣的农业社会的扫荡，可以恰当地用“剑击碎了圣杯”来比喻。等这两千年的战乱结束之后，世界已然变得面目全非。高举圣杯的女神雕像消失了，代替她们的是手握利剑的威严的男性神祇，女神都降低成了男神的妻妾或姘妇。在现实社会，身强力壮的、感觉迟钝的、粗野的男人占据着社会等级结构的各个统治者位置，他们把游牧民族军队中统治关系的等级结构系统（hierarchical system）放大成了具有固定等级结构的统治关系社会模式。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男性统治者都享有特权——统治、压迫、争斗、掠夺、破坏和享受。从最早的父系文明遗址出土文物来看，一夫多妻、奴隶、君王陵墓和殉葬出现了，男神雕像、武士陶俑、防御工事、兵器仓库随处可见。最精良的技术是用金属制造武器的技术，最发达的行业是兵器制造业。历史成了单一的男性统治的历史和他们征讨伐的记录；艺术品不是对战争的颂歌，就是对血腥场面的描绘。

这以后才开始了以往世界史教科书中讲的西方文明的起源，以及作为西方文明主根之一的《圣经》里讲的“上帝造人”的故事。

被西方世界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和东正教奉为最高神经典和律法的《圣经》，特别是前半部《旧约》，实际上是确立了人类的男性一半对女性一半的压制性统治之后，由希伯来教士对古代神话、历史故事和宗教律法

进行七拼八凑改写成的。这一重新创造男性神祇、制造男性统治的神圣性和永恒性假象的工作持续了上千年。

我们在《圣经·旧约》里读到的唯一的、全能的、最高的神是一个男人——上帝耶和华。他其实是从闪米特人好战、残忍和容易震怒的战神耶和华演变来的。他现在成了全知全能的父、降灾赐福的君、世界的唯一主宰。他单人只手创造了世界，用泥土造出了人类始祖亚当；因为觉得他太孤单，才取他身上一根肋骨造了女人夏娃。夏娃不听从上帝耶和华的戒令，受蛇的蛊惑偷吃了伊甸园善恶树上的智慧果，又送给亚当吃，造成始祖犯罪，双双被放逐到地上。这样一来，女人从一开始就低男人一等，成了男人的附属品；而且，罪孽更深重，永远要受男人管制；怀孕生育，多受苦楚。在《圣经·旧约》接下来的几百页里，我们可以读到许多父亲和丈夫把自己的女儿或妻妾交给男性匪徒去强奸、毒打和杀害是合法和合道德的故事。上帝耶和华不但没有任何的愤怒或谴责，有时反而对这样的男人给予特别的保佑！可见《圣经》在树立男性统治关系社会模式的权威方面做得多么露骨，走得多么远。

在艾斯勒的第一本书《圣杯与剑》里，作者把欧洲历史上以“剑”为象征、以男性统治和女性被压迫为特征的统治关系社会模式取代史前无文字记载的以“圣杯”为象征、以女性和男性平等参与为特征的伙伴关系社会模式的巨变过程，称为“女性历史性的败北”、“文化转型”、“文明的改道”和“西方文明男性统治关系社会模式五千年的弯路”，又申言在西方文化中，“女性因素”和“女性气质”、“男女平权的伙伴关系社会模式”并没有完全消失。作为西方社会系统和文化中潜在的一种吸引子，它同另一种显在的吸引子——男性统治关系社会模式吸引子，有五千年消长争斗的历史。

她接着分析在《圣经》后半部《新约》里，耶稣体现的非暴力女性气质和男女伙伴关系精神。在古希腊文化中，从某些女神和女祭司发挥的作用，可以看出依然有很强的男女伙伴关系的因素；而罗马文化采用的则是典型的男性统治、嗜血尚武的社会模式。在欧洲中世纪黑暗的一千年里，政教合一的统治关系社会模式非常强固，男人憎恶女人，迫害女巫，消灭异端，妇女只是男人的性工具和生育机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重新唤醒了古希腊文化中和耶稣身上的女性精神。近代随着科技进步、产业革命、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共和国代替了君主国，世俗学校代

替了教会学校，双亲家庭代替了宗法制大家庭，女性主义运动一直在向前推进。在欧美民主国家内，妇女赢得了恋爱婚姻自由、教育和工作权、选举和被选举权，经历了性解放。

但是，艾斯勒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强调个人私欲，激烈竞争，贪得无厌地追求利润，所以具有等级制的阶级结构，以及继续用暴力进行征服和扩张的倾向；由于男性继续在地位、财产和家庭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所以它仍然是男性统治关系社会模式。更有追随叔本华、尼采这种极端的男性统治论思想家的新法西斯分子，他们甚至贬斥《圣经·旧约》代表的犹太—基督教传统完全不是男性统治的，因为里面有许多“女人气”的“奴隶道德”。他们鼓吹恢复古代库尔干人、雅利安人的尚武传统，实现纯种雅利安人男性精英统治世界的美梦。即使在美国这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度，也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新右派，他们公开反对妇女享有合法的生育自由和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在社会主义苏联，虽然在早期曾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提倡男女平等，但在斯大林统治之下，仍然退回到依靠大规模暴力镇压的专制主义，并且没有完成对家庭内部父权制关系的变革。在世界范围内，则有形形色色的原教旨主义者通过恢复妇女戴面纱的传统，实行性隔离的法律，禁绝言论和出版自由，处死异端和发动圣战，迫使妇女回到传统的服从位置。由此可见，新的文化转型远未完成。

艾斯勒认为，目前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诸如军备竞赛、战争威胁、恐怖主义、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都同这场新的文化转型尚未完成相关。因为这种男性统治关系的社会模式总是推崇“剑”的力量，总是依靠压制、暴力、战争和破坏来维持，把女人当做传宗接代的生育机器，并对大自然进行贪婪的掠夺和摧毁性的破坏。所以，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有待这场新的文化转型的完成和男性统治关系社会模式的消亡。当世界系统进入再也无法逆转的突变分叉点之后，它将面临多条进化轨线的选择。最佳选择不是建立男性统治关系的极权的等级结构社会模式，而是向史前男女平权的伙伴关系社会模式复归，建立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社会模式；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都应发生重大转变——这就是全人类的一次新的文化转型的完成。我们有理由相信，艾斯勒创作这三本书，其初衷就是要促进全人类的意识进化和文化转型，实际上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在创作出版第一本书《圣杯与剑》之后，艾斯勒打算切换主题，写一本后来出版时名为《开创自由》的书。在为这本书搜集资料和做阅读笔记